

传统文化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罗本琦 著

CHUANTONG WENHUA
YU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非
外
借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人才项目：高校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资助项目

传统文化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罗本琦 著



CHUANTONG WENHUA
YU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罗本琦著.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676-3292-9

I. ①传… II. ①罗…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2543号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罗本琦 著

责任编辑:陈 艳 陈贻云

装帧设计:任 彤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208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3292-9

定 价:48.00元

如发现印制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 001 / 导 论 文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002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及其文化背景
- 007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 014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
- 019 /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论品质
- 019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
- 038 /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
- 050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
- 056 /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
- 056 / 一、儒学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与发展
- 069 / 二、中、朝、日儒学的理论特色
- 089 / 三、儒学对东亚文化圈的影响
- 106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 106 / 一、文化精神的契合：文化融合的前提条件
- 109 / 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神
- 120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契合



133 /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133 /	一、社会主义法治的伦理基础
142 /	二、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族精神支撑
152 /	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162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使命
162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
171 /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180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
191 /	结束语
193 /	主要参考书目
197 /	后 记

导 论 文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设立标志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多视角、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繁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文化视角的研究显然是不可或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理论体系——首先是人类优秀文明或文化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传教士以及留学生们把它介绍到中国的时候，也是作为一种文化来介绍的。只不过早期传播者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一来自异域的思想“从其一开始传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它，在短短的几年内便蔚为显学，仅用了二十几年的功夫就席卷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胜利。”^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时的中国，不仅处于民族矛盾尖锐、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的时期，也处于东西方两种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抑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都与中国特定时期文化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使命，无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何诠释，都不可能忽视其文化内涵。再者，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机制，也离不开文化研究的

^① 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自序第5页。

视角，而研究的主线总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及其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谁首先提出来的？什么时间提出来的？学术界有争议。

程中原认为，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做组织工作报告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不过他的用语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由于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而且被六届六中全会所接受，因此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总结党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的产物，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说这个命题的第一次提出，可以采取以下的表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①。

王诚宏在《也谈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一文中重申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认为，毛泽东是在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张闻天则是1938年11月15日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即程中原文章中的“组织工作报告”，毛泽东的报告在前。张闻天的报告中用了“马列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报告中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行文本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毛泽东在将这个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由“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句修改而成的^②。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应当是毛泽东。

^① 参见程中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

^② 参见王诚宏：《也谈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世纪桥》，2008年第15期。



侯波、张喜德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由共产国际最早提出，而中共随即呼应并逐步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共产国际关系十分密切。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也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本国化、民族化、时代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思想。”^①其主要依据是共产国际七大前夕和七大期间，季米特洛夫提出的改变共产国际过去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的策略，强调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策，把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指示、外国经验与本国具体环境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体化、民族化、本国化。王先俊也认为：“五四以后，知识界逐步形成的学术‘中国化’的共识以及当时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化’问题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逐步累积成熟起来的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中去的思想观点，是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最主要方面的学理资源。”^②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溯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产生于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阐释是在1938年前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到概念的提出，毛泽东都是主要代表人物。至于是谁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溯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结合（逻辑上当然包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观点。而列宁主义本身就是这一成功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早在1843年9月马克思在筹办《德法年鉴》时，就态度明确而坚定地宣布：“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③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杜林等

① 侯波、张喜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过程与共产国际七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2期。

② 王先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学理探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人的过程中反复阐述自己的立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曾写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明确地指出,《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而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必然要走这样的发展道路。马克思针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教条主义诠释马克思观点的行为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①晚年恩格斯在指导美国工人运动中一再提醒和强调:不要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硬性灌输给美国工人,而应该多引导美国工人在实践中探索和逐渐掌握科学的理论。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给美国社会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写信,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②“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能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从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③1887年1月27日,恩格斯再次写信给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重申自己的反教条主义态度。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④恩格斯在1895年3月致德国经济学家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明确提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56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

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恩格斯曾严厉批评了一些德国年轻人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当作标签而生搬硬套的做法，他在1890年6月5日致德国青年政论家保尔·恩斯特的信中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②两个月后，即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又在致德国青年学者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③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或命题，但他们反对教条主义的立场，他们把共同创造的理论视为行动的指南，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涵。至于列宁，他不仅是反教条主义者，而且是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俄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者。因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溯源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还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但从建党后即投入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实践来看，党的早期领导人还是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倾向。虽然“左”倾路线标志着党内教条主义一度盛行，但教条主义的存在不意味着没有人反教条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就是坚定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从建党初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到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哪怕是萌芽），哪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国化的成功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萌芽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时期。1938年前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并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讨，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的时代，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中国人开始冷静地找回鸦片战争后一度失落的文化自信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或意识以及理论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几千年一脉相承，到鸦片战争后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究其原因，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外来文化的冲击，因为在此前的几千年中也不断有外来文化渗透或冲击。只能说，这次的外来文化与往日比较，有着质的差别。一方面，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文化自信在民族危亡的边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民族危亡唤醒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意识，救亡当然不能放下本土文化的根本，于是有了“中体西用”之说，有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中国人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从器物到制度，一方面努力坚守着东方古老民族的“体”，试图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中体西用”的思路虽然与“中国化”的思路不可混为一谈，但不能否认其中包含着“中国化”的成分。到20世纪初，西方学术的“中国化”在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中已经形成共识。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说：“要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加基督教化，更加中国化。”1924年《中华教育界》第8期上发表了舒新城的《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文中说：“此时我们所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1927年，庄泽宣在其著作《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说：“现在中国的教育不是中国国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国化，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显然，在学术界20世纪初的“中国化”已成思潮。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并没有终止，只不过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民族性”进一步被张扬。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等十余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称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努力去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恢复“中国的特征”^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抗战后文化民族主义开始盛行，思想界和知识界十分强调“民族性”的问题，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才得到发展。这个阶段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中出现教条主义有着直接关系，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视野的讨论无疑是当时中国大文化环境的产物。而且，文化角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更早一步，“在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前，像陈唯实、艾思奇、胡绳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较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对‘中国化’的内涵作了较深入的思考，也发表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这些思考及其思想观点不仅进一步强化和丰富了知识界有关学术‘中国化’的共识，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②。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形成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以艾思奇、胡绳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前民族解放运动关系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另一种是毛泽东以一代政治大家的风范，探索以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道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把马克思

^① 参见王先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学理探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② 王先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学理探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主义的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但无论毛泽东还是艾思奇等人，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研究的焦点。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不同诠释中，文化视角的诠释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诸如，当人们从“结合”的角度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有人强调这一结合应当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这三个基本方面^①。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发展、创新的文化意蕴就是实现了中国的文化转型^②。至于国外学者，虽然他们偏重于从文本与方法论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但也同样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美国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和中国的历史、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并从母语化、大众化、民族化、具体化和理论创新等五个层次诠释这一结合的内涵。雷蒙德·怀利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简洁地概括了中国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的探索，它代表中国共产党认真地尝试以一种大众化的方式去向中国广大民众介绍一种复杂的外来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蕴涵着独特的文化层面。在其文化的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一个国外意识形态学说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品格相融合的问题^③。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理解，浓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及其理论成果。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一直在尝试着反省传统文化的同时寻求中国

① 参见陈占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期。

② 参见左亚文、韩美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维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③ 参见[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林育川译，《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文化的出路，只是始终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努力。洋务运动在实践上开“中体西用”之先河；维新变法虽然把向西方学习的边界扩展到制度文化方面，但本质上是“中体西用”的延续，坚定的“保皇”立场足以说明这一点；辛亥革命可以看作是突破“中体西用”的尝试，但并未成功。辛亥革命后，复辟逆流（张勋复辟与袁世凯称帝）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没落激发起进步思想家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一方面，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加剧了中国人民对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反感，推动了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想家们试图在古老的中国寻找文化复兴的希望，但丝毫没有削弱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呼声。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以及巴黎和会上各列强对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公然侵犯，击破了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梦。于是，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挣脱了“中体西用”的桎梏，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选择，开启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以俄为师”标志着中国人走出了洋务运动以来寻求资本主义文明救中国的怪圈。“以俄为师”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也是或者说首先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因此，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就坚定地把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基本任务或者说两重基本含义：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相结合以解答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那么这种文化的结合就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条主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主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或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地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扎根、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靠内部力量推动是很难实现的。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一脉相承。长期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使

这一古老的文化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还与同样沿袭了几千年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证明：这一超稳定结构中的文化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消解外来文化的能力。这或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一脉相承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秦汉以来，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域外文化先后传入中国，并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但丝毫没有改变中国本土文化的本质。即使鸦片战争后蜂拥而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也没有动摇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换言之，没有成功地推动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

因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需要外在的文化力量推动，需要优秀的外来文化元素为之提供新的营养乃至新的方向指引。选择什么样的优秀文化担当这一使命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品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担当起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革命，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功能实现得如何，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得如何，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的经验。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或者说作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占有重要地位。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到中国的，因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几乎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一开始也是在文化领域展开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语言的中国化，即使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或“灌输”（列宁语），本质上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成功的。如果要追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能够成功？人们通常会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等方面回答，这种回答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够。我们认为，重视文化上的“结合”是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成功地中国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所有西方社会思潮都曾在中国传播，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迟到的真理”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在文化精神上相通，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予高度重视，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将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民族文化整合的历史使命，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飞跃”^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重要性。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那么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则是这一伟大实践的先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正是这场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迷信，为改革开放扫清了观念上的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更是文化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以及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例如，“一国两制”的方针坚持了社会主义主体的发展方向，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符合港澳台地区近百年来发展的实际。从文化方面来看，“一国两制”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灵活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解决中国国家统一问题的伟大创举。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重大决策与实践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成果，同时又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成功实践，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分不开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共中央对文化的功能与作用日益重视，对文化规律的把握也越来越准确。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① 罗本琦、汪青松、余精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首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得到巩固。邓小平曾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①“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②

其次，中共中央适时调整了文化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③党的十二大报告则明确指出：“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④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发展，中共中央把文化发展的方向定位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再次，重新确定了教育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主持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教育，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年时间内恢复了高考制度。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⑤。“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关于文化发展的战略思维，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基本战略方针。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④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9页。